

目 录

我县第一家国营商业

——中国贸易公司广东省恩平县公司……………冯洽庭（1）

从科举到学堂

——近百年教育演变见闻……………陕西 陈哲文（7）

“杰出革命之母”

——简介唐琼昌先生生平……………美《少年中国晨报》（23）

飞行员潘泽光事略……………关中人（26）

纽约恩平联谊会名誉会长郑春炎……………郑 成（29）

医学士梁栋卿……………梁焕章（35）

武师陈醒南……………无 为（39）

回忆恩平县立救济院……………岑梦华（42）

横陂圩史略……………莫天荣（46）

大陂村沧桑……………郑瑞正 黎锡锋（50）

恩平地名琐谈……………郑叔欢（52）

加拿大恩平总会馆简介·····	(55)
新加坡恩平同乡会史略·····甄锡田 胡年润	(67)
若干华侨史料·····美国 郑其贤	(61)
海外华人分布概况·····资料组	(65)
恩平旅韶(关)同乡会·····冯文藻 梁焕章	(67)
 恩平之最(三)·····沙 陇	(70)
 诗词四首·····加拿大 冯瑞祥	(73)
马年咏马·····余凤鸣	(75)
律诗四首·····广州 梁邦基	(76)
 著匪冯景浩伏法记·····香港 张文仕 郑寿桐	(78)
 对《恩平印刷业》一文的补正·····吴卓儒 郑泽民	(86)

我县第一家国营商业

——中国贸易公司广东省恩平县公司

冯 洽 庭

1950年6月16日，我县第一家国营商业“中国贸易公司广东省恩平县公司”成立。首任经理林兴、副经理吴卓坚。该公司于1957年5月结束，历时近七年。

贸易公司是个过渡时期的国营综合性公司，也是唯一的商业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壮大国营商业阵地，加快国营专业公司的建立，扶助基层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指导下，其具体任务是支援农业生产，满足城乡人民生活消费，稳定市场，平抑物价，逐步发展国营商业网点。七年的积极经营，艰苦创业，做出巨大贡献。

1950年，恩平县贸易公司接过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残缺不堪的旧市场。初期，商品缺乏，物价不稳定，贸易公司便从省与江门公司调回大批粮食、棉布、油糖、肥料等主要商品，充实库存，大量供应，稳定市场。同时，组织私营商业，积极做好市场供应工作。当时，由于各方面原因，有部分私营商业主，申请停业，经营不积极；部分开业的却又积

极图利。同年8月，市场煤油供应较紧，只有贸易公司有售，而库存有限。少数商户得悉，以批发价到贸易公司抢购煤油60多砵（每砵30市斤），乘供不应求之机，高抬零售价出售。当时，贸易公司又没煤油抛售，抑制物价，造成市场一度紧张，群众意见很大。第二天，贸易公司即将市场情况向上级公司反映，并提出要求，随即调来煤油200砵，批发零售均按原价大量供应，平息了个别私商的哄抬煤油价风潮。此次，既平抑了物价，稳定市场，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又增强群众对贸易公司的信誉。

同年夏收，农民大批粮食上市，不少私营粮商不收购。有的私营粮商乘机到市场压价购入，由原来每百斤6万元（旧币），压至5万元，农民损失很大。县贸易公司针对市场新情况，即采取措施，订出合理价格，按质论价，每百斤稻谷为6—7万元。同时在恩城、横陂、船角、圣堂等圩市设仓大量收购。此次既维护了农民利益，稳定农民生产情绪，也为国家经营粮食业打下了基础。贸易公司既与私营商业争夺市场，又对私营商业进行了一次改造。

1951年，农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城镇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有的私营工商业者涉及运动的，皆已停业。余下的工商业者对经营方向不明，经营缩手缩脚；有的缺乏资金，以致市场不够活跃。于是县贸易公司协助他们，组织联营社。1951年冬，把十多户私营油粮副食杂货店联合起来，组成联营社。这个社取名“广益联营社”。顾名思义，它是为广大群众利益而设的，也是我县第一个联营组织。该社是

在国营贸易公司的主导下开展经营的。为帮助他们解决资金不足，县贸易公司拨出部分主要商品给予“经销”或“代销”，活跃市场经济，效果很好。1953年，在总结“广益联营社”的经验后，应群众要求，把余下的私商经营的油糖副食杂货店联合起来，组织定名为“大同联营社”，这是我县第二个联营社。至于县内各圩镇（区），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船角、沙湖、那吉、横陂、朗底、牛江等地的国营商店相继建立和开业，初步形成全县商业网络，年购销总额逾百亿元（旧币），销售额占市场比重将达一半，发挥了国营和供销的主导地位，贸易公司的经济也得到较大发展。由于资金、货源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得到解决，为逐渐过渡到1956年的公私合营创造了有利条件。

支援农业生产，帮助农民渡荒，也是县贸易公司一项主要任务。1951年春旱严重，尤其是横陂、尖石（1961年划归开平县）等区，农民缺粮缺钱，难以生产自救，灾情较重。贸易公司针对各地情况，相应作出对策，抽调大批人力，分头下乡，向农民收购山草、木柴、木炭等。农民手上有了钱，生活困难就能解决。贸易公司又派员到新会、开平等县兄弟公司商议，调来粮食万担，结合收购供应粮食，缺粮户及时购到粮食。1952年春，由于去年遭受水、旱、虫灾，水稻歉收，春荒严重，全县有87000多人缺粮，占当时全县总人口35%。县贸易公司与全县37家石灰窑订购石灰万担，发放预购款2.6亿元（旧币）给石灰窑，由石灰窑向农民收购山草，帮助农民渡荒。公司悉心为农民解决春荒着想，那年冬天就从省贸易公司调进冬种小麦种子数千担，投放给横陂、附城（今平石镇）、君堂、尖石等灾区农民种植。这批

麦种发放未完，上级发现是迟熟麦种，会影响明年春种。于是通知停发，但已来不及收回。县贸易公司承担国家对农民的责任，减少由于工作上的失误而招致农民不应有的损失，公司即派出原来负责发放种子的副经理吴卓坚，带领工作组到农村去，向农民解释和检讨，同时逐户登记已播麦种数量、施肥数量，计算总值赔偿给农民。那些已领麦种而未播的，则如数收回。这项工作共耗时两三月，全部落实，群众十分满意。1953年4月，全县绝粮户2236户，6261人，县贸易公司除积极在全县收购土药、柴、炭、杉、板、杂木等外，还请示县人民政府，获准举办全县农、工、商物资交流大会。会上与农民签订产品购销合同，成交额达19亿元（旧币），帮助农民渡荒，支援了生产。1955年春，我县遭受到历史罕见的大旱，从1954年9月到55年立夏后两天才下透雨。早期长达8个多月，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使当时全县断粮户2500户8100多人，饿病饿肿的460多人。县贸易公司急群众之所急，委托尖石、那吉、朗底等区供销社土产收购站，收购土药中的新品种良羌。不料他们未经认准，误把山羌当良羌，每担收购价20多元（新币）。当时那吉、尖石等地一度出现挖山羌热潮。有的农户全家总动员，披星戴月，进山挖掘，一个晚上竟挖了10多担，排队交售，收入二三百元。未及半月，各站共收购假良羌3100多担，国家损失7500多元。这次，贸易公司在土产品收购工作中，又受到一次深刻教训。

1951年，将粮食和油脂类的经营分出来，成立了县粮油公司。1952年又把布匹、百货类分出，成立县百货公司。1954年又将生猪、三鸟、蛋品的经营分出，成立县食品公司。同年，国营与供销社实行城乡分工经营。贸易公司将圣堂、

船角、沙湖、牛江、尖石、那吉、朗底、横陂等国营商店所有人员、房舍、商品等全部移交给各地基层供销社接管经营。1955年至1956年，县贸易公司又将烟酒、药材、医药、糖果糕点、木材等专项商品，分别成立专卖公司。到1956年全县专业公司基本建立起来，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也分行业归口国营专业公司和公私合营；农村的基层供销合作社也建立和健全起来。恩平县贸易公司作为过渡时期的国营经济，已完成其历史任务，于是1957年5月结束，并入恩平县商业局。

恩平县贸易公司，原址在恩城中山路86号（今新城百货商场内西边两卡）。铺内一边办公、一边经营，楼上为职工宿舍。1950年9月，原址扩大经营，办公地点迁至桥峰路旧桥头原“活龙”茶楼。县贸易公司成立近七年，七年来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支援农业生产，满足城乡消费，稳定市场，平抑物价，逐步发展扩大国营商业阵地，其功不少。

回顾在贸易公司工作的年月里，干部职工都兢兢业业，艰苦奋斗，把完成一项任务作为一件莫大的光荣。50年代初，县内交通不便，除省道通汽车外，县内主要靠自行车和步行。县贸易公司摊子大，业务多，人手少，全系统干部职工不足百人。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员，每天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要到附近基层帮助收购和售货，每逢圩期都要下乡。逢一六在恩城，二七到那吉，三八到朗底，四九到船角，五十到圣堂、沙湖等地收购站，帮助售货和收购土产品。每到沙湖、牛江等地，则先乘汽车到江洲或马坦，然后步行约20华里，才到目的地。如去尖石区则准备几天才能回来。去尖石有两

条路可走：一是由江洲去牛江渡经西坑到土皮坑，绕道西湾地区出夹水圩，过大沙圩和鹤洲圩到尖石，这路线要翻山越岭，走羊肠小道，要步行约七八十华里；二是由马坦到沙湖，穿过那梨、浴水，经梅岭、陈田、灯山径（开平辖）、岗咀村，越过尖石河。这路线多是弯弯曲曲的田洞或丘陵小道，要步行约60余华里。如取道沙湖过开平马岗，雇请单车到尖石，则最省时，单车费可报销，但没有急事同志们都愿意走路，习以成风。当时下乡没有出差补助的，途中茶水自备，或自己掏钱，公私很分明。我一次去朗底协助收购杉板，开发票时不小心，多写60元（新币）支给卖板人。回来后发现，责任在我，我自觉地提出，按照计划在每月经30多元工资项下，每月扣20元归还公司，三个月还清。这次教训很深刻，使我以后工作更小心谨慎了。

我们的工作十分艰苦，却不改其乐。记得1951年冬，因收购稻谷时，稻谷含水量超过标准，入仓后仓库通风设备较差。经检查，贮在冯家祠（今水电局仓库）粮仓的2000多担稻谷发热，要马上翻晒，而首先要做转围散热降温工作。这件工作由公司办公室的干部职工负责。当晚，20多位人员，整夜操劳，有的用竹箩挑，有的用麻袋二人抬，下围上围，人来人往，十分紧张。虽时属隆冬，却人人汗流如注，尽管感到肩痛、腰酸、脚软，却坚持不懈，直至完成，甚为自得。

恩平县贸易公司干部职工，数年如一日，不为名，不为利，艰苦奋斗，为发展城乡经济，保障供给，促进我县经济繁荣，创立国营商业作出重要贡献。

（本文作者为原恩平贸易公司干部）

从 科 举 到 学 堂

——近百年教育演变见闻

陕 西 陈哲文

在封建科举年代，唐朝张九龄（曲江人）被称为岭南第一人。到了明朝，广东才出过海瑞（今海南省海口市人）、袁崇焕（今东莞市人）、屈大钧（番禺县人）等。晚清时，又出了康有为（南海县人）、梁启超（新会县人）黄遵宪（梅县人）等。恩平当时虽是穷乡僻壤，在元、明、清代也出了吴复初、冯竺斋、梁熹、黄如爵、莫如士、莫如善、梁达才、梁元桂、吴文俊、邹若灏、冯浚等十二名进士，钦赐翰林，以及吴松、梁元楨、吴汝让、郑润霖、陈钟毓等一大批举人和生员。他们有不少人宦游于外省外县，逐渐赢得了岭南多才子的美称。下面就近百年来我对教育演变之所见闻，分为四个部分整理于后，请有识者指教，还让后辈对百年来之教育的演变，有所了解，而受到启迪。

开科取士 “学优则仕”

开科取士，是封建王朝公开选贤任能，发展教育事业的

一项措施，也是推行学而优则仕的奴化教育制度，其目的是为巩固其封建王朝的统治。封建制度的教育，首先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唐代的贞观、开元年间，李家王朝曾靠几个文人学士，励精图治，开科取士，拢络人心，鼓吹“唐皇盛世”，粉饰太平。“安史之乱”就科也不开，士也不取了。元世祖忽必烈初入中原，要主中国，遭到南宋遗老遗民的反抗，碰了钉子才来软的，硬把宋朝宗室十分寒酸的赵孟頫拉出来，封他当个有职无权的官。清朝满人进关以后，玩弄的也是武力和拢络两手。虽然把明朝的几股重要的武装拉过去，但仍遭到遗臣遗民和民众的长期的激烈的反抗。到了康熙年间，清廷吹嘘的“国泰民安”的形势仍很不妙。康熙大兴“文字狱”也解决不了问题，还得亲自到曲阜祭孔，恭听明朝秀才，《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讲经。他回朝后又大开“博学宏词科”，才慢慢缓解了一些激烈的矛盾。因此，开科取士只能说它是统治阶级作为安抚广大群众的一种政治手段。

科举制本身，有许多限制文人发展的条件。比如，大比之年，就是规定三年才举行一次乡试；翰林以上出身的官员，要提拔高官厚禄的大考，也规定十年才举行一次。连郡（邑）庠生，即考秀才的庠生入学考试，也有一定的限制。补廪是生员中三年才举行一次；拔贡，据说是生员中十二年才有一次机会。我们村里陈春坪是个老秀才，可他的科名很不“走运”。他的儿子陈炳华已经考中秀才了，但他还是个“白衣秀士”。听说他的夫人很生气，打了儿子两记耳光，狠狠地教训儿子一顿说：“你父亲还未入学，你偏偏要跟他抢先，争来了又有多光荣？！”后来，陈春坪考上秀才，儿

子陈炳华又碰上考拔贡的机会，又考上了拔贡了，而老子还是个秀才，始终没有考拔贡的机会。这不是陈炳华的过错，而是封建社会科举制的弊病。

科举制还有个制义，考试规定要用八股文。八股文严重束缚着人的头脑和手脚，使人动弹不得。它规定有很烦琐的格式，每篇文章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八个部分，也叫八比文。破题，即开头用三两句话去点破题意；承题，是承接破题而加以阐述；起讲，则为议论之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以后，还有四股，就是主题议论的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定有排比对偶的文字，合拢起来就称为八比、亦即八股文。这些硬性规定的文章格式，除世代官宦之家外，穷乡鄙里的孩子，既难找到名家教授，也不容易找到样本和蓝图来模拟仿学。至于出生于文盲和半文盲的家庭，简直怎么也想不到这些条条道道。我记得二十年代初期，我还在村里上大馆，偶从隔桌的学友手中借来一本八股文的手抄本，我正看得眼花缭乱时，不防私塾老师在我身后发现了。他说这是他家的藏书，急忙从我手中夺走。而借给我看的学友，又赶紧出来，从老师的手上夺回去。因为村里曾出过几个秀才和举人，他们孩童时还是兄弟伙，你我共读，后来发展为几房人。他们的父母，都希望后代读书成名，所以把这些古董当宝贝，书面上的名字，改来改去，争夺不休，各不相让。

八股文这类制艺和教材，初看了使人感到五花八门，难以适应；钻进去又把人绞得呆头呆脑。前面说了我村里一位兄长，他是安分地读了一辈子八股文，严格地按格式规定去下功夫。他的思想和文字被弄得太死板了，所以没时间去博

览群书，增广知识，思想和文字就难以适应考场和生活的需要。邻村一位伯父陈惠民，也是个很下功夫的郡庠生。他未入学前，参加考试的次数很多，就因他钻八股文太认真，文章总是四平八稳，而主考官都粗心大意，不爱看这类文章，故此他的考卷总被扔进字纸篓里。他最后一次考试，一进入考场，就感到肚子痛，他又感到这次考试一定失望了。他左手按着肚子，右手执笔考试，应付了事。这一来，却排除以往拘紧呆滞的文风。主考官却认为：他文才流畅，字体秀丽，反而考上了。人说他是个“肚痛秀才”。事实肚痛帮了他的忙。要不，他怎能放开手脚，显示出他的真实才华。

科举制里还有个写好蝇头小楷的条件。字写不正、不匀称、不流畅的不行。老辈常说，字为文章“衣冠”，据说考翰林更讲究。字不匀整秀丽，不是行楷兼优，不是文才毕露，就很不容易当上翰林。这一来，就有好多人被几个字所限制住了。考个秀才，是入学的功夫，要求知书达礼、诗文都懂，已不容易。再要写好八股文，字体还要工整秀丽，实在困难。我们村里有好几位因学制艺，兼顾史、诗等爱好，对于小楷下的功夫相对少了，考了多少场都没有入学。可是，这些人教授出来的学生，也中秀才了，就是自己成了终生“白衣”。听说，旧社会不少读书人，屡屡名落孙山，不是文章写不好，而是字体欠佳，以至遗憾终生。

科举年代的文人出路是个大问题。当然，历史上也曾有过封建帝王为文人学士找过出路的。明成祖朱棣夺取了建文帝的王位后，迁都北京，改号永乐，就着手编一部《永乐大典》。他前后委派学士解缙、姚广孝等组织了一个两三千人的工作班子，“纂修四库之书，募购天下遗籍。上自初古，

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义分，著为奥典”。当时辑入的图书，全书22877卷，凡例和目录六十卷，分装成一万一千多册，约三亿七千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百科全书，比后来英、法的百科全书早三百多年。可惜原稿在英法联军入京时被火烧和抢走，剩下的只是嘉靖年间手抄副本730卷，仅占原书3%强。清代也从康熙到雍正年间，编出一部《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规模最大、用途最广、体例最完善的一部类书。这出于帝王的谋略，给文人找点出路，是件好事，但只发生于个别时间和个别人物身上，然而也不能彻底解决文人的出路问题。从我们家族的情况看，秀才、拔贡，甚至举人，大多没有找到适当工作。从咸丰年间开始，我族郡庠生陈启心、陈襄云先后在外做过一任训导和儒学正堂；文举人陈桂荣曾受聘到台山县广海书院担任一年学老师；黄步头一位武举人，听说没有找到什么差事。其余的邑庠生，有时会受聘到外乡设馆讲学，然三五年也不易碰上这么个机会，他们大部份时间在家赋闲。至于“白衣”或初通文学的人，有机会则在本乡本村设私塾，穿上鞋袜当先生，教学徒认几个字。每逢村上有红白二事，帮写对联和年庚帖式。碰不上机会，只好赤脚下田当农民了。世代书香的也要准备两手，一部分人读书求名，一部分人则种田求食。每年春节贴春联时，横额写上“耕读传家”四个大字。教育后人要准备两手。旧社会一般对文人、学士，甚至一个蒙学教师都很尊敬。但也有讽刺文人的话：“穷秀才，没乐来！”这是讽刺文人？抑同情文人？还是讽刺社会？这就说不准了。旧社会文人的处境如此，怎能劝导父兄教子弟入学读书呢？1《儒林外史》写过一名穷老秀才倪霜峰，21岁入学，

蹉跎37年，结果“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最后要卖儿鬻女，此是科举出路的一个典型。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经过戊戌政变，由于大势所趋，兴起了废科举、立学堂的新潮流。1905年（光绪31年）正式宣告：废除科举制度，推行学校教育。这个功劳，还要记到南安张之洞身上。张之洞本来是戊戌变法的支持者，而且他早就利用维新派的势力，去对抗当时最大的保守势力——李鸿章。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了，张之洞又强调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帝党观点有原则的分歧，尽力和维新派划清界限。正当帝、后两党争得不可开交时，慈禧也要争取大臣的支持。她认为张是个很简单的人物，也就把他的地位保留下来。因为1884年中法战争中，他起用了名将冯子材，打败过法国侵略者，为清朝撑过面子；在两广总督任期内，还开办了广东水师学堂和陆师学堂，创办过兵工厂、矿务局、办广雅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材。可以说文事武备并举，声望很高。1889年张调任湖广总督，在汉口和汉阳的建设，成绩更加显著。1901年他连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会奏变法条陈：力奏不及时变法维新，国家将难以富强，朝廷的威望难以恢复。而且他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正合慈禧的心意。只要保住清王朝的面子，又能富国强兵，她就接受这个奏议。1903年，慈禧批准在北京商办一所京师大学堂，并同意在各省试办中小学堂，还逐步试办初级师范和优级师范学堂，以解决师资问题。1905年，清政府明令颁布：推行学校教育，废除传统的

科举制度。1906年，提拔张之洞为协办大学士，擢升为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从此，他成为晚清最红的人。然而已是日落西山，时近黄昏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为清廷订出的教育方针。它包括忠君爱国，尊孔读经和保存国粹；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新方法，学习西人的船坚炮利。这就像他早在两广总督任内所作。先开办广东水师学堂，还办一所陆师学堂。分别聘用英国教练，招收学生七十名，分设管轮、驾驶两科。学习机轮制造原理及运用之法，还开天文、海道、驾驶攻战之术。课程还设外语，兼读四书五经。学成后拨入船队实习一年，再选拔才艺优秀者，出国留学深造。陆师学堂则聘用德国教练，分设步、骑、枪炮、营造等课，参照天津武备学堂及水师学堂的办法教练，三年毕业。课程还开德文，兼读四书五经。同时，他办的广雅书院，也是分科分业，为当时的洋务工作服务。还有他开办的汉阳铁厂、兵工厂、纺织厂、缫丝厂和制麻局等，反映出他的“实业救国”的苦心。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梁启超）。事实，从科举到学堂，这个变革本身就迈进了一大步。从此，选拔人才，就不专靠考场的功夫，而是要参加实地训练，还要日常的苦心钻研。因此，各省都在进行中学（四年制）和高小的试办。在广州早期，不仅已办有普通高等小学，还办有专业小学（如陆军小学）；不仅办有初级师范（如教忠师范），还办有高等师范大学，即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后改名为广东省立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的前身）。1908年，恩平县立高等小学堂也办起来了。歇马崇本小学（完小），沙湖的积

礼小学也于同年以民办形式办起来。几年后，区村的吟梅小学也开办了。当时的高等小学，质量是很高的，清政府还例授生员待遇。一个高等小学毕业生，可享受原来的秀才待遇。最早的小学堂，是按“三三制”试办的，学生年龄一般是十二岁到二十二岁，最大的有结了婚，年龄达二十六七岁的。他们几乎都受过启蒙和开讲教育，年长的早就文理通畅，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了。我在君堂上高等小学时，也常设法找县立高小的学生作文选辑来作样本。除学它的议论文的论点和逻辑外，还学它的叙述、抒情手法，特别赞赏他们把各种应用文揉和到一篇通俗文言的小品里，成为现代短篇小说的雏型。他们学中文，学外语，文理兼学，还有图、工音、体等术科，知识面之宽和文学运用之熟练，前清秀才实是望尘莫及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始终停留在试办中。在城市里，各种学校数量少，招生人数不多，所以“中学为体”的实施，只占八成；“西学为用”，是要接触到新事物的那就更少了，约占二成左右。那时，大中城市尊孔读经的私塾，仍像汪洋大海一样。广大农村没有学校，根本谈不上什么教育改革了。这期间，学校的必要课本也供应不上，课外读物就更少了。当时的课本，是上海翻译局译编的。因印刷条件差，中小学课本，多半给京城使用，发到各省的只限于样本。三十年代初，我在广州旧书店发现一本，用“甲乙丙丁……”代替“A B C D……”；用线装袖珍本出现的几何课本。它选材不系统，内容简单，图表贫乏，文字阐述不清。据说，那时收到一本样本，就当宝贝，只落在少数人手上。我还见过一本国文本，第一课是：“光绪皇，好皇帝……”

爱新觉罗·载湫的画像插图占了三分之二。就这样的课本，省里已不多，很难发到县了。在县城除县立小学有机会看到样本外，其他圩镇及农村学童，只能照旧念《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和《千字文》了。广大农村在废除科举后，依然是“子曰”、“诗云”；还可以花钱捐个“功名”，三十两纹银可买个九品“监生”。有门路的官宦之家，他们的子弟仍然得到朝廷例授贡生、举人和进士的职衔。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制也就受到破坏了，也许这就是它的本质。

从科举出身的秀才和举人，大多脱离生活实际。他们很少接触到世俗，也最怕别人找他代写契约和婚丧礼帖，甚至写一封信也感为难。在我们家族和乡村中，能显露出才华的不一定是读书人。传说村里有创造性的书札家是陈大作。他只读过几年私塾，也没专门学过书札。他看不惯年青人在外讲吃穿。他就给在外跑生意的儿子陈训典去信：“一个卖灰（石灰）子，焉能爱着绉纱裤……”他儿子也给父亲回信：“人凭一身衣，树靠一层皮。不讲穿和着，怎样做生意？！”大家都直来直去，有什么想法就说什么。我读了三四年私塾后，父亲从国外写信回来，母亲总叫念给她听，还要我回信，当时我非常胆怯。长辈总是拿陈大作父子写信的事来鼓励我，还说出过去一秀才的笑话：有一次，有人请秀才写一封信，可是等了三天三夜，信稿还未写好。又一次，厨师请他代记一笔账，说买菜刀一把，开支双毫银一元钱。那人等了半天，那秀才说快写起来了。只见账簿上写着“古者刀就是钱，钱亦能买刀。”他说话时，正在添上一句“杀鸡焉用牛刀？”这虽是笑话，然而确有这一类的书呆子，受八股文